

翁同龢研究

2017

王忠良 主编



广陵书社

不發信 歲晚物閑 農家之
宜景况也 昨得信知 胃納不旺 經
未和極 恐系良藥 難得安在
方慎守之 尤須各以 導引之法 外
能除痰止心 在道引 必飲食起居
不敢稍怠 宜病為 不可不者 舒且
勞又必須靜 勞則筋力 充靜
果亦即病之 要法也 吾
父未痊 昨見其子 跡似稍健
件西同已於 去月十日 匯寄 寄古重
表西鄉太荒 上宏別荒 征熟
得為之 刻 至租戶 藉荒 概無
折其荒乃 伸氏之病 時宜 長亦當
別不 宜針 醫矣耳 長已

翁同龢研究

2017

王忠良 主编



广陵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翁同龢研究. 2017 / 王忠良主编. — 扬州 : 广陵书社, 2017.8

ISBN 978-7-5554-0838-3

I. ①翁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翁同龢 (1830-1904) — 人物研究 — 文集 IV. ①K827=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06226号

书 名 翁同龢研究 2017

主 编 王忠良

责任编辑 徐大军

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

扬州市维扬路 349 号

邮编 225009

<http://www.yzglpub.com>

E-mail: yzglss@163.com

印 刷 扬州市机关彩印中心

开 本 720 毫米 × 1020 毫米 1/16

印 张 25

字 数 300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54-0838-3

定 价 56.00 元

学术顾问

戴 逸 翁万戈 谢俊美 唐力行 戚俊杰
翁 飞 戴鞍钢 张 剑 马忠文 翁以钧
钱文辉 朱育礼 赵 平

主 编

王忠良

编委会成员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王忠良 许 霆 孙 政 沈 潜 陈 斌
姚 远 曹培根 黄沁怡

主 办

翁同龢纪念馆

目 录

人物访谈

- 戴逸先生访谈 / 许 霆 沈秋农 访 陈 斌 整理 3

家风传习

- 知止而后能得——论翁同龢的“齐家” / 王忠良 21
- 晚清官场勤政廉洁的典范——翁同龢 / 谢俊美 46
- 翁氏家族廉政文化的启示 / 曹培根 61
- 翁同龢政治伦理与精神遗产刍议 / 徐梁伯 73
- 为官清正，操守廉洁
——对翁同龢回籍安葬父、兄、妻一行的考察 / 李梦芝 85
- 翁心存的人格与翁氏家风的形塑 / 张 剑 93

瓶庐论丛

- 翁同龢与严虞惇、钱廷锦手批苏诗 / 樊庆彦 99
- “甲申易枢”的待解之谜 / 姜 鸣 107
- 文脉的守望——常熟翁氏家族藏书考 / 孙迎庆 111

诗书忠厚之泽可及于无穷

——常熟翁氏的家族文化及当代价值 / 王忠良 116

“帖底碑味”的翁同龢书法与晚清上层官僚文人的书法取向 / 邵 宁... 120

两朝帝师翁同龢书法成就探赜 / 侯东菊 127

崩塌后的书法秩序

——我心目中的翁同龢 / 胡传海 132

常熟翁氏收藏撷珍 / 陶元骏 138

吴熊光《伊江笔录》稿本清末整理情况探述 / 周 蓉 144

从翁氏家藏尺牍看咸丰季年安徽战事 / 沈从文 152

翁同龢书信的刊行、整理情况 / 马忠文 160

翁同龢与光绪本《愧林漫录》 / 柳向春 164

道光二十五年翁同书致翁心存手札考释 / 李红英 172

琼林济美

琼林济美——上海图书馆翁氏藏书与文献精品展 / 黄沁怡 189

翁万戈先生贺信 193

翁氏藏书及文献与我（1919—2016） / 翁万戈 194

我所了解的翁氏藏书 / 翁以钧 202

上图展出翁氏藏书二十七种原件 / 罗 昕 213

《翁氏藏书与翁氏文献》前言 218

《长短经》首发暨翁氏藏书整理研究座谈会综述 / 孙 政 222

翁同龢藏书文献辗转回归上图秘闻 / 黄春宇 228

松禅书院

翁心存鉴宝

——常熟曾经出土越国国器“姑冯句鑑” / 俞秉麟 239

《翁同龢日记》亟待深入开发

——读翁同龢光绪七年正月十一日日记小札 / 李梦生 244

冤乎冤哉：《西行寄弟函》揭示“翁李交恶”的臆测谬误 / 翁以钧 ... 247

临风怅伫话之园 / 姚 远 251

小南园涉趣 / 一 疏 256

同和讲堂

中国近世女性与家族文化的传承 / 徐雁平 265

从清廷政争看甲午战后翁同龢的政治境遇 / 马忠文 274

文献辑存

《海珊自纪》校注 / 翁曾翰著 朱新华校注 281

《瓶庐丛稿》的内容及其历史价值 / 谢俊美 308

翁氏题跋辑录 / 苏 醒 319

新书荐读

《常熟文史纵横谈》 355

《西行寄弟函》 360

《翁氏藏书与翁氏文献》 365

《翁同龢日记》稿本 369

《海外馆藏中国文物精萃》 373

《儒门经济长短经》 378

翁馆纪事

大事记（2016 年）..... 385

后 记 / 许 霆 393

人物访谈

戴逸先生访谈

许 霆 沈秋农 访 陈 斌 整理

按语：戴逸，原名戴秉衡，1926年9月生于江苏常熟。现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、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、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。主要著作有《简明清史》《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》《20世纪中华学案》《清通鉴》等。

2016年12月26日，许霆、沈秋农、陈斌等赴京戴逸寓所拜访戴逸先生，并就清史研究和翁同龢研究等话题采访了戴逸先生。

沈秋农：戴先生，我们这次到北京看望您，带来了您参与整理出版的《吴玉章回忆录》，先请您谈谈您担任吴玉章秘书的情况。

戴 逸：这个你们带来的？哎呀，真是费心了。那个时候，1959年上半年我去了越南，下半年回来，当吴玉章的学术秘书，时间要到1960年了。我担任吴老秘书之前，他有个秘书，但那个秘书不是搞历史的，所以一谈历史事情他都不知道，许多人的名字也不知道怎么写。当时我在搞近代史，刚好了解“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”这一段，所以吴老讲的这些人和事我都知道。吴老那个时候要写回忆录，他每天吃过晚饭，七点不到就坐在沙发上跟我聊天，聊他的一生。哎呀，那吴老的一生真是革命的一生。戊戌变法时，他思想已经非常开放了。他是四川人，他讲的这些（说明）整个辛亥革命他全参加了，而且辛亥革命在什么地方最热闹，他就在什么

地方。关于同盟会成立，他记得大概是1905年八、九月份在东京开的成立大会，但具体哪一天，他记不清了，宋教仁、黄兴都去了。吴老是四川荣县人，他是代表四川去参加成立大会的。开会选举孙中山当同盟会总理，黄兴副总理，还有宋教仁、汪精卫、胡汉民、章太炎，这些人都在里边。现在留下来的名单中有一个吴永珊，就是他（吴玉章），他当时担任评议员。同盟会第一次成立大会他就参加了，他是元老呀！

《民报》被日本人封刊后，吴老就跟章太炎到日本的法庭上去（抗辩），开庭时他们两个出席的。同时，他跟汪精卫也接近，汪到北京来刺摄政王，（本来）要他跟着来的，后因他在家做炸弹，所以没有来，否则他也被抓在里头了。（刺杀未遂）汪精卫和王复生两个被抓住了。王复生也是四川人，当汪精卫的副手。吴老不主张到北京来冒这个险，但汪精卫一定要来。汪精卫抓了以后，他还想救汪，就又到北京来了。那真是冒险了，当时正在抓人呀！他有个亲戚把他拉回去，（后）到了香港。到香港时，正好碰到（广州）黄花岗起义，他又凑上了。黄兴要起义，召集了很多，他跟熊克武，一个四川有名的将军，他们两个人坐着船，准备晚上进城（广州城）来支援，他们在船上时就听见了城里的枪炮声。那时城门已关，里面已打起来了，所以他没有卷在里面，否则的话也死在里边了。之后，他就回家到家乡四川荣县。（那时四川）刚好（爆发）保路运动，他就在荣县搞独立，（这）比武昌起义（还要）早上几天。五卅运动时，他到上海，正好也赶上。所以，吴老是革命的老前辈。

沈秋农：在参与整理《吴玉章回忆录》之前，您就有《中国抗战史演义》出版，我们想知道您写作此书的情形，也想知道您的写作同您在常熟亲身经历的抗战生活的关系。

戴逸：写作《中国抗战史演义》时，我在中国人民大学革命史教研

室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。那时读到一本用章回体写成的解放战争史，从而激发了写作热情，几乎每日沉浸于写作之中，一个月就完成了从“九一八”事变到“卢沟桥事变”的六年抗战史，分列8回，约4万字。后因工作繁忙，曾两次中断写作近一年之久，但热情不减，一有机会就埋头写作，甚至连恋爱的时间都花在写作上。《中国抗战史演义》的写作，当时既无人要求，也没想到出版，我只是将人民群众的苦难、中国军民英勇抗争的历史和日军种种血腥暴行记录下来，作为自己的一次练笔、一次习作。这次写作，确实同自己亲身经历的抗战生活有关。可以说我青少年的“花季岁月”是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蹂躏下度过的，饱受难以笔述的欺凌和苦难。1937年我刚好小学毕业，8月的一天，我在常熟大东门外亲眼目睹六架日机肆无忌惮地轰炸常熟县城。这次轰炸中，常熟市中心方塔附近的民房、学校、尼姑庵成了轰炸的目标，南门外市场更是死伤了很多。抗战期间，我的父亲被抓去关押在苏州达两年之久。一位堂兄因参加新四军，在战斗中负伤被俘遭枪杀，另两位堂兄为此受株连而下狱。表哥是南京附近的游击队长，在争取伪军反正时因谈判破裂遭日军枪杀。姐姐则因与重庆的同学通信，被日军宪兵队查获后传讯，虽获保释，但勒令不得离开常熟城。……我还亲眼目睹，日军冲进教室将一位参加抗日的同学绑走。被老百姓称为“常熟之狼”的日本宪兵队长米村春喜，还曾带兵去戴府搜查。当时，一名新四军战士在“清乡”中因伤在我家门楼上躲避，幸未被发现才躲过追捕。这段历史的体验，对我来说是铭心刻骨的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急需这方面的宣传读物。当时抗战过去不久，没有一本全面真实地描写抗战全过程的著作。全国人民都殷切期望了解这段历史的真相，而此书是演义，虽陋拙，却填补了空白，满足了大家的愿望。因此1951年初春交出书稿后很快出版面世，购书者络绎不绝。至于著作出版并未落款戴逸而署名王金穆，这是因为“金穆”是我在学生时代投稿所用笔名，“王”

是母姓。我带着特殊感情写作《中国抗战史演义》，就是为了让大家记住这段历史。一个民族，如果忘记了过去，就不能正确地面对现在和未来，这是我进行历史研究始终抱有的观点。

沈秋农：抗战期您在家乡常熟生活时，什么事情给您印象深刻？

戴逸：我对森泉印象很深。当时我们逃难就住一个姓冯的富农家里，就在森泉镇的镇梢上，家有三个兄弟，房子很大，是新建的。抗战中，那家的儿媳妇被伪军打瞎了一只眼睛，我父亲还帮助调解，后来赔了些钱。当时还有个森泉人毛柏生，和我父亲一起在森泉开布厂。

当时森泉有个姓殷的新四军，在乡下与日军打仗时受伤了逃到了我家，他是个男的，40来岁，在森泉开茶馆作为联络点，手受了伤，但伤不重。我认识他，我逃难去森泉时，常去他的茶馆玩。他就躲在我家门楼上，门楼是没有楼梯的，楼梯要从上面放下来的，人上去了，再收上去，在下面看不出是个楼。后来也不知日本人怎么知道了消息，宪兵队长米村春喜带着人到我家来抓人。当时有“江阴老虎”“常熟狼”之说，米村春喜就被称为“常熟狼”，抗战后被枪毙了。当时我就在家，十三四岁，也不怕，就跟他们闹，我说你们怎么能乱闯到我们家。米村春喜倒也没发脾气，他说我们要找人，要到屋里看一看。我说你们看吧。他就带着两个日本兵和一个翻译。那个翻译姓陆，那人坏呀，后来被枪毙了。那天我父母都不在家，就我在，我知道他们找不着，因为藏在门口的楼上，下面看是看不出来的。那新四军平常不下来，除了大小便，吃饭也经常我送，我跟他很熟。那个受伤的殷姓新四军在一个月以后就走了，是在晚上走的，那时晚上日本人也不怎么出来。日本人在常熟时间长了以后，晚上一两个人也不大敢出来，怕暗杀，所以也很小心。日本人驻在老县场，那里有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。宪兵队驻在跨塘桥。我对跨塘桥印象深刻，那里我们都绕着走，里边养着

狗。旁边的人家说，到晚上有狗叫的声音和审讯犯人的声音很大，鬼哭狼嚎，老百姓称为鬼街。

对过去的事情进行研究和解释，正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和未来。人们之所以重视历史科学，也因为他们带着现实中的迷惘和困惑，不得不求助于历史，寻求比较正确的答案。

许 霆：您先研究中共党史、中国革命史，后又研究中国近代史和清史，与清史研究结缘半个多世纪，您曾经有文章《我和清史》谈到了对清史研究的特殊感情。

戴 逸：是的，我对清史研究有着特殊的感情。《我和清史》是我有感而写的文章。我在文章中说：“清史是我的专业，我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它。可说是寝于斯，食于斯，学于斯，行于斯。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，精神之依托，生命之安宅。”我常读清史，爱读清史，也常写和爱写清史文章，尤其进入老年，专嗜清史，几乎摒弃其他书籍于不观，谢绝其他文章而不作，集中精力，专务清史，专写清史。因为清史的书籍和资料浩瀚广博，无穷无尽，就是毕生专读清史也只能读极小部分。人的生命太短促，只能就广阔无垠的清史知识海洋中掬取一勺之水，或观其大体态势，或测其某个角落，并不能达到全真和全知。“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”，这句话，我到老年体会得越来越真切。清史研究是自己的工作、专业与职责，我刻志自励，以至诚之心力求敬业，用探索精神去追求未知，用怀疑精神去发现问题，用勤奋精神去搜寻资料，用科学精神去分析疑难，用理性精神去阐释历史，在客观历史千变万化的运动发展中寻求其规律，真实地清晰地揭示历史的真相。司马迁说“究天人之际，穷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，我材质驽钝，难期高明，虽不能至，而心向往之。我的清史研究著作已近20本了，我这儿（书房）的不全。我主持并促成编辑的著作

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，有800本，比《四库全书》都多；《盛宣怀档案选编》是前年出的，一套10万元；《李鸿章全集》是我和顾廷龙编的。我的5部代表作：《中国近代史稿》《尼布楚条约》《简明清史》《乾隆帝及其时代》《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》。我的代表性文章应该是《论清官》（载《人民日报》1963年5月27日）和《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》（载《历史研究》1998年第6期），以及我从中国史学会会长任上退下来后的一些演讲。

许 霆：能不能说说您对清史和清史研究的理解。

戴 逸：要了解清史学术方面的情况，就要了解清史学科是怎么建立的。清史学科在我们以前是没有的，清朝的时候它自己建立不起清史学，它只有歌功颂德；等辛亥革命了，都是骂清朝的，骂它干了许多坏事，闯关的时候屠杀，后来搞文字狱、搞闭关政策，把中国害得不轻；（再）后来外国人打进来了，又打不过人家，就投降，干了很多坏事。但（满清）也干了许多好事，它的历史地位是被抹杀了。在辛亥革命后的整个时期，清朝都没有得到好评，清朝就是腐败的代名词，也没有人去研究它。当时的历史学家都在研究先秦，郭沫若、范文澜等都在争论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，近代史是没有的，清史就更没有了，康乾时期也没有。在20世纪清朝灭亡后的几十年里（清史研究）没有，抗战后也没有，一直到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清史教科书连一本都没有。后来我们就觉得这样不行，对清朝的评价不公平，当然清朝有很多缺点，但也有几件大事。一是统一了中国。以前中国是不统一的，总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打仗，如与匈奴、鲜卑、突厥、女真、西夏、蒙古等，中国历史是一部农耕民族被游牧民族入侵的历史。游牧民族靠放牧是吃不饱的，有些东西，如衣服、粮食等非得从农耕民族中去攫取。汉代时的匈奴就是抢，“和亲”后就有了“互市”，农

耕民族的粮食和游牧民族的马进行交换。如果关闭互市，那就会开战，所以互市非常重要，形成了茶市、马市等。游牧民族只吃肉、不吃茶等是不行的，不利大便，所以游牧民族对互市就有依赖。农耕民族打不过游牧民族，但游牧民族进关后建立的王朝都被汉人同化了，现在北方人里面许多都是以前关外进来的游牧民族，有蒙古移民、满族移民等，他们也都改成了汉姓。现在北方满族移民比比皆是，我的两个儿媳妇都是满族人。满族一进来首先拉拢蒙古，满族和蒙古的关系非常好。拉拢了蒙古后又拉拢西藏，因为蒙古和西藏都是一个宗教——喇嘛教。后来北方就有了稳定的关系，本来长城很重要，但清朝时长城就不起作用了。后来日本侵略中国，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抗日，乃至溥仪当了儿皇帝，连满族人都都不理他了。他（溥仪）的父亲（爱新觉罗·载沣）都不去（投靠日本），只效忠中华民国。近代以来，如果没有满清的话，我们现在的民族统一还成问题。明朝是太弱了，不愿走出去。（康熙）签订《尼布楚条约》时，派去谈判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汉人，康熙帝派谁谁都不去，太远了，到宁古塔都很远，何况去尼布楚。当时第一次派出的代表中有两个汉人，其中一个就是常熟人，叫钱良择，他还留下了的日记《出塞纪略》，记了他们走到蒙古时，那里正在打仗，就回来了，第二次他也不去了。汉人是“让你去谈判又不是让你去打仗”都不愿意，你说怎么去统一啊？满族完成统一就是用兵打，不服的就是噶尔丹，打败了噶尔丹，蒙古就服了，后来满族和蒙古的关系非常好，进行通婚等。满清为什么要建避暑山庄，就是为了拉拢蒙古。因为蒙古人一到北京就得天花，水土不服，所以就建了个避暑山庄。康、乾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避暑山庄，他们为什么在那里，就是为了统一。清军入关到康熙前期，中国各地是各自为政的。长江以北是清政府管辖，长江以南最初归属南明政权，后来发生了吴三桂、尚之信、耿精忠等人的三藩之乱，他们占领了大半个中国。台湾完全由郑成功的后代统治着。北中国有强大的